

聂耳眼中的清华

▣ 金富军

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当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，这发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旋律不禁让人心潮澎湃、热泪盈眶，也自然让人想起它的曲作者、英年早逝的天才作曲家聂耳。

聂耳的生命只有短暂的二十几年，但正如流星划过星空，留下了耀眼的轨迹。在短暂的生命里，聂耳只来过北平一次，逗留不足三个月。在北平期间，聂耳几次到清华，或参观、或演出。在他的日记里，也记下了他对清华的观感。

1932年8月7日，聂耳乘船离沪北上，11日经天津乘火车到他向往已久的古都北平，住在宣武门外校场头条胡同3号的云南会馆。一住下来，聂耳便和在北平的朋友逛公园、看演出、玩乐器等，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。

到北平前，聂耳便嚷嚷着“去清华”。直到9月7日，聂耳才第一次到清华。这天早上八点，聂耳从云南会馆动身，错过了汽车，便乘坐人力车，一个多小时后才到清华。聂耳在日记中写道“四辆洋车颠了一点多钟，半路的让车很讨厌，看那些车夫却很平常，他们互相的礼貌却是使人佩服”。

清华校园给聂耳很大的震撼，或许是美轮美奂的校园给聂耳印象太深，在他笔下，没有写典雅的工字厅等传统园林式建筑，只写下清华“全是欧化的洋式建筑，图书馆、大礼堂特别漂亮”。9月7日正是新生注册之日，门口挂着“欢迎新同学”的大字，“男女招待员守在门口迎接，签名后的头一关是到医院体格检查。再进一个宏大的建筑便是所谓的招待处，是体育馆。”

第一次参观清华，给聂耳留下极为深刻印象。

“清华的环境着实太好了，我玄想着要是我现在的



聂耳（1912-1935）

里面的学生，我将会很自由地跑上大礼堂去练习音乐，到图书馆去读书，到运动场去打球，……一时思潮起伏，追忆起学校生活的乐趣”。

在北平期间，为了提高演奏水平，从9月12日到10月15日，聂耳请著名的俄国小提琴家托诺夫辅导。这一个月，聂耳收获巨大。他觉得托诺夫教授方法好，“托诺夫着（实）是个好教授，他很注意 piece 演奏，常学下去一定可以学很多的 concert，并且他看我的技术还不低”。托诺夫对聂耳的才华很欣赏，也对他寄予厚望。9月17日的辅导，托诺夫“先叫我拉 scale，后来问我《Mazas》怎样。我说第一本已练完，他要我给他第二版 No.32, Legato Exercise, Schradieck, 拉 7th position 给他看，调子拉 Sovvenir de Moscow, Gypsy Air、Minuet(Mozart), 他非常满意。”“他说我的左手很好，右手持弓是德国的老派持法，现在这些 violinist 都不是如此持法，他把我的食指移进来，多部份的握着弓，这样觉得比较紧些。”

在9月25日的日记中，聂耳写道：“到北平来算是第一次拉了这么长的时候，自上午八点钟拉到下午四点钟。这也是逼得不能不如此，托诺夫把我看高了。他给我这 piece 是一个显技巧的东西，作曲者 Viotti 是和大演奏家 Paganini 同享盛名的，曲里着实有困难的地方”。应当说，短短一个月，

聂耳收获巨大。当聂耳假托家庭经济困难离开北平向托诺夫告别，诺托夫很遗憾地说，“啊！这对于你的功课来说是一个顶大的障碍，你是一个顶聪明的孩子，你将来的提琴会拉得不错的”。

托诺夫1930年9月来清华任教，除了教授小提琴、钢琴外，还担任军乐队指挥，将军乐队训练成北方较有影响的管乐队。托诺夫熟悉清华重视文艺的传统，鼓励聂耳考清华，但聂耳最后没有报清华，而是报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。可惜的是，聂耳落榜了。

10月28日，清华大学东北同乡会在大礼堂举行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游艺会，请聂耳参加演出。这次演出邀请“芭莉芭剧社”（俄语“战斗”）。在此之前，聂耳还参加了10月16日在朝阳大学举行的募捐游艺会演出，并在会上认识了清华学生，也是托诺夫学生的陆以循。“五点半由中（南）海起身，西直门坐洋车去的，几个冷包子、干烧饼便算混过晚饭。”在清华大礼堂，聂耳小提琴独奏了《国际歌》，老志诚钢琴伴奏。当晚还演出四个独幕剧，“所演出的剧以《战友》为差，其余《S.O.S.》《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》《乱钟》还不错。”

当天清华的演出，还有点小小波澜。聂耳准备的节目是演奏《国际歌》，但在开幕前，有人不同意，一些学生也起哄，但聂耳还是坚持演奏。当晚，在清华还出现了一些反对标语，为此剧团还提出了抗议。当天在清华食堂，聂耳遇到了吴宗济。吴宗济热情地带聂耳到宿舍，并给聂耳看前一年罗明佑生日联欢会的签名簿。

第二天上午，聂耳等在大礼堂前（按：《聂耳日记》是这样写的，可能有误。那时由清华进城的汽车一般停在校门口。）等车回城。有人邀请他跳非洲舞，聂耳说：“你们别忘了这儿是Gentlemen's university”，可见聂耳对清华的向往之情。不过后来聂耳还是欣然接受了，“他跳得活

跃而欢快，大家都非常高兴。他又带头唱起革命歌曲，大家都兴奋地跟着唱。雄壮嘹亮的歌声震动着清华园，很多围着看的同学都热烈鼓掌欢迎。聂耳很激动，唱了一个又一个，《国际歌》唱了好几遍，在汽车上一直唱到西直门。”

在北平，聂耳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，“没有生活费、学费，心神不定……会馆里不能充分地用音乐功夫，换句话说，这不是学音乐的环境。”同时，他始终在思考日后的道路，是立刻投向高涨的文艺救亡活动，还是在大学深造进一步提高。

他在9月7日参观清华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我想到若是进了平大艺院，重新再度学生生活，这会令我感到何等的悠闲，更想到以后参加‘清华’的乐队演奏。但是，回头想想过了两三年的平静生活以后将怎样？！算了吧，还是不要异想天开！赶紧决定走那条路？在北平，回上海？”很快，聂耳做了决定，要投入到火热的救亡运动中去。他在9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老实说，考什么学校？我何必要这样软化下去？！我回到上海去有着我的紧要任务，试问我进三年的学校比做三年的事是那一道的希望大些？就说音乐吧！在北平，尤其是在‘艺院’，绝不会比上海好的，何况我在上海还有免费的教员。”正如他所说，“以后将更勇敢地去实践人生，在这里面取得伟大材料、创造伟大的作品”。

11月5日是聂耳在北平的最后一天，也遇到了本年第一场雪。聂耳以抒情的笔调写道：“下雪了！多美！这是今年北平的第一次下雪，她庆祝我在北平第一次演剧的成功！她欢送我明天的离平。”离开北平后，聂耳到了上海，全身心投入到火热的救亡运动中，但他对北平的这段生活仍念念不忘。1936年7月，聂耳饱含感情地写道：“北平生活把我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注入正流的界堤。”